

论实地研究中的资料判别

董海军

(中南大学 社会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本文以实地研究经验为基础,对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进行反思。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问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方法上是缺失的,而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实地研究中的资料判别的方法至少包括:研究者在方法意识上应对影响资料可靠性的因素保持清醒认识,在实施调研中应注意观众效应,在资料收集上应多方求证资料,在资料分析与呈现上应规范化。

关键词 研究方法; 实地研究; 资料判别

关于定性研究效度(validity)问题有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在定性研究中可以使用“效度”这一概念,但不能沿用定量研究的定义和分类。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个概念不适合定性研究,主张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如“真实性”和“可靠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论是“效度”还是其他类似的概念,都不适合定性研究,因为这类概念以事物是独立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认为研究者可以识别并验证其客观真实性。而定性研究者认为“客体”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它在与主体的互动关系中相互影响。研究者对事物的理解不是简单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主体与客体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重新相互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逐步获得对客体此时此地的理解。从事定性研究的人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定量研究所指的“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本身,而是被研究者眼中所看到的“真实”、他们看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对理解被研究者眼中的“真实”所产生的影响。^①

在社会研究的四种研究方式中,实地研究^②是唯一一种具有定性特征的研究方式。因此,关于实地研究效度问题同样面临着这些争论。除了上述观点外,风笑天认为,相对于问卷调查中最大的问题——表面化、简单化现象,实地研究的深入观察、设身处地地感受、理解,具有很高的效度——研究者测量的确是他所希望测量的概念或现象^③。

本文无意涉及上述争议,用研究资料的判别来

指称资料的获取方法反思(包括研究者以何种身份何种途径获取的研究资料)、资料的可靠性与资料的内在趋向判别等。获取途径虽然与理想状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目前的研究中大多在研究方法或去实地入场中大致会谈到。而资料的可靠性与资料的内在偏向判别却为研究者所忽视。资料的可靠性指获取的资料是一种“真实”的资料,而不是资料的提供者为了应付研究者而“制造”出来的资料的程度。资料的内在趋向是指资料提供者的利益立场趋向,还牵涉到研究者的自身立场。

一、目前国内实地研究资料判别的缺位

(一)从已有的实地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实践来看,实地研究资料的判别是缺失的

风笑天对定性研究综述中指出,20年中,除了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的探讨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基本上都集中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几篇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探讨的论文。^④陈向明从定性研究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过程、具体方法、检测手段等方面比较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日益兴起的“定性研究方法”^⑤;并撰文对定性研究(她后来改称“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陈向明指出,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研究者个人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 2007-09-16

基金项目 2007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税费时代乡镇社会利益抗争分析与协调机制的构建”(07YBA010)

不论是作为“局内人”、“局外人”还是“双重人”,研究者个人的身份都与研究的其他维度有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给予了有意识的协调,这对研究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⑥

风笑天等曾以《社会学研究》1986—1996 十年间所发表的所有实地研究报告为分析样本,从研究主题、研究的类型、资料收集方法、研究地点的分布等方面描述了十年来我国实地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其特点,并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对近十年实地研究的发展、进步与所存在的某些不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指出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对个案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作说明、资料的收集方法上深入性不够、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说明简单等等,这是在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资料的收集方法上,我国的实地研究中,以收集第二手资料(即由个人或机关记录的文字材料,包括私人文件、各种统计资料、调查报告、总结材料及书籍、报刊、文章等)为主的实地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在小城镇或区域的发展研究中这种情形显得尤为突出。^⑦

上述的“资料的收集方法上深入性不够、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说明简单”都与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有关。研究者依靠收集第二手资料而又不作出判别,因此其使用的研究资料存在片面反映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资料的可靠性、准确性就很难以判定。

实地研究强调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在最经验的层面上去观察记录事实,寻求真实地反映社会事实的第一手的材料。材料的深入性、全面性与真实性是实地研究成功的基础,也是实地研究构建理论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它可以说是实地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然而在研究中,资料的可靠性与资料的内在趋向未受到研究者有意识地重视。因此,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的需要显得更加突出。

(二)与调查研究这一研究方式相比,研究资料的判别处于相对缺失

实地研究和以问卷法为主的调查研究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研究方式这一层次上的直接体现,一直是社会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研究中,实地研究的使用频率仅次于调查研究,而远高于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可以说以定性研究为特征的实地研究是以问卷为主的定量的调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⑧可是研究资料的判别在问卷数据处理上,有

较多的讨论,并且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处理。问卷调查研究者对于可能影响问卷的回答的因素作了充分的估计,并采取各种方法尽可能地得到真实回答,同时,一个个较简单的问题及选项使被访问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匿名身份。同时,问卷调查研究者,通过大样本和概率来达到统计推论的有效性,也通过查错纠错及废弃问卷等方法来对资料进行判别。可在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问题,鲜有提起注意,也很少讨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相比问卷调查中一份份抽象类似的问卷,实地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是具象鲜活的,独特单一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内心对资料有一种呵护备至的心态,不情愿持怀疑的态度。第二,实地研究的资料,不像定量研究那样采用随机抽样,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信效度检验,而且没有事先设定的、可以量化的检测指标。即便人们对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可重复性和适用性表示怀疑,研究者也往往对此避而不谈,于是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问题一直不成为一个问题。第三,问卷调查研究者受调查研究的局限,常常处于不能深入得到真实情况的质疑声中,他们对于资料的真实性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状况,可由于实地研究者对资料的亲历性而易产生盲目相信,对资料提供者的利益立场缺少应有的清醒认识,也较少受到资料可信度的质疑,从而丧失应有的判别。

实地研究资料的判别处于相对缺失,反映了研究者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中存在着几种误区:一是误把研究对象的叙事或收集到的研究资料的叙事等同于事实真实。二是注重个别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轻视事件整体的现实感。三是过于强调必然性,而忽视其中的偶然性因素。四是误认为实地研究是中立的,不涉及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卷入。而实际上,行动者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论他们是来自机构内部的局内人还是来自机构外部的局外人,他们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权力、利益色彩。

导致这些误区的原因之一是论者对“真实”概念的理解有失偏颇。其实,“真实”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实际上都是主观经验,只不过不是任意的主观经验,而是有条件或者限制的主观经验,是建立在具体语境中的、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主观经验,是一种“共识真理”^⑨。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对资料判别的必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实地研究资料判别的必要性

如果实地研究的资料无需判别,那么上述的问

题也就不成问题,反而是一种正常了。可是资料需要去伪存真,不仅在理论上需要我们对实地研究资料进行判别,而且在实地研究实践中需要我们对许多影响资料可靠性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

(一)从理论上分析,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是符合反思社会学要求的体现,也是实地研究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的要求,同时反映出社会研究者应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也反映了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学术道德规范

1. 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是符合反思社会学要求的体现

反思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并非是现有社会学中众多的专业性分支之一,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通过反思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世界的时候容易犯唯智主义的偏见,这不仅有助于反思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提高,也有助于培养社会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对自身及其研究手段和对象的“反思”惯习。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缺乏反思性的研究,其无论是采用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还是人文主义的参与观察法,都无法理解实践的本质性特征,因为它们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回避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对科学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反思性的目的就是扩大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以增强它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⑩当代反思社会学不仅与以前其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区别,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其根本目的在于对社会学研究者本身及其学术实践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⑪因此,反思社会学要求研究者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研究资料的判别体现了反思社会学的特征,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要求实地研究进行资料判别。

2. 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是实地研究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的要求

陈向明综述了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三种: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及批判主义,并指出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定性研究一般基于解释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性建议和预测上。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世纪60年代末以前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反动。^⑫

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反动”有矫枉过正的意味。陈向明同时也指出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即使是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解和理解当事人观点的重要性,也提倡在做评价和提建议之前首先对事情的“真相”获得一个全面中肯的认识^⑬。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资料判别是有必要的,强调资料判别是对定性研究过分“反动”地修正。

3. 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反映了社会研究者应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也反映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学术道德规范

从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的角度来看待研究资料,实地研究者对资料判别就更为重要。社会学研究(包括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区别于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种研究所具有的经验性。这种经验性的特征使得社会学研究除了要遵循分析和综合的基本规则、遵循思维和判断的逻辑性要求外,还必须面临大量的具体操作、技术手段、实地实践等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再是抽象概念和理论框架,也不仅仅是对具体方法技术的简单学习,而是研究者所具有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⑭。实地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而在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要求方面远远与调查研究不相匹配,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实地研究对方法的要求不如调查研究高。实质上,作为经验性研究的实地研究在技术方法方面还不太完善的基础上更需要研究者提升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

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也反映了研究者所具备的学术道德规范。研究者在呈现研究结果时,考虑到资料的判别,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造假或抄袭的嫌疑。而在学术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出现过^⑮,一些研究因使用的资料而受到质疑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资料判别不规范。

(二)从实践上看,实地研究的资料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需要研究者对其充分估计并自觉反思,才能保证研究资料的可靠

实地研究所获取的研究资料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研究者的因素

当一个认识主体被赋予实体的特性时,所谓的认识对象便都只是特定认识主体眼中的现象。或者我们因此可以说,认识者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超出他自己的体验之外。在没有进行彻底的现象学还原的情况下,由当下的现实体验推导出的,是体验的直接相关者——此在存在之自我,可是,既

然认识是对主体内部知觉体验的再意识,既然每一个直接当下体验着的自我都独自承担着认识,那么,显然任何一个自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出属己的体验而达到别的自我。^⑥因而可以说研究者的影响因素广泛存在。

一方面,研究者对调研对象或调研的事件可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收集的资料的可靠性。

实地研究者的观察并非像照相机或显微镜那样处于所观察的对象之外,实际上,观察者是他正在观察的对象的一部分。无论是参与观察还是实地访谈,研究者的参与本身对其所研究的对象都会造成影响。怀特在《街角社会》的后记中写道:“多克以前的行为是出于直觉而现在却要考虑怀特会怎么想。”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实际参与观察中“设法避免使这个群体受到影响”,但不管研究者如何注意,他的出现和在场在客观上必然会对其他人的行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⑦笔者在一个有关利益抗争的实地调研中,当地的研究向导告诫我:“你去问他们这事,是对他们很大的支持,有时甚至会激发他们的继续抗争。他们以为上面重视了,于是事情可能还会闹大,可能激发矛盾。”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调研者对调研对象的影响,从而影响到调研所关注的事件。研究者的出现有时候还会给“守门员”和当地的人们带来疑虑和恐慌,特别是当他的一些行为与本地人的规范不相符时。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巴莱特(R. Barrett)在一个西班牙村子里做田野工作时,他对当地人的言行做笔录的行为便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⑧。

另一方面,调研者所拥有的入场身份与方式影响到其收集到的资料的种类和数量。陈向明在分析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时指出,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研究与其说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不如说是双方的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这是因为研究者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等待着被“认识”的“客体”。因此,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方式不仅会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获得信息的源泉。^⑨苏力依据其本人所做的许多调研经验指出调研者本人拥有资本的多寡以及某一种资本的多寡有可能影响了调研者的知识权力,因此影响他可能获得的“知识”的种类、数量。^⑩调研者有时需要一种正式的调研者身份,有时需要一种非正式的私人身份(甚至隐藏着调研

目的),有时是两者俱需要。依据不同身份与入场方式所获取的资料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笔者在基层调研中,就发现乡村往往都有两套材料,一套是表面的,应付检查和外人的,而另一套是自己内部掌握情况的(有时并未成文,是心照不宣地存在着内部人心里)。因为这一点的存在,所以记者调查时常常需要乔装打扮,有时需要卧底。俗话说,“见人说人话,见鬼产鬼话”。研究者正在收集资料时,对于调研对象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反思自己在调研对象眼中的身份以及调研对象对自己的期待。

同时,研究者自身的立场对于收集的资料及资料的使用也有影响。比如某著名学者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中的农民领袖,有组织抗争的组织者,依法抗争的带头人,可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模样^⑪:

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指《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却不认同他们。如“群英谱”中的某某,长期霸占本组的鱼塘承包款至今一文未交;所谓“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某某,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释放后回老家,有家有室却一直霸占一个农民的妻子;“群英谱”中的某某,复员后在供销社工作,对抗政府主要是因为超生四孩被开除回原籍;“群英谱”中的某某,在作小学教师时因强奸幼女被判刑,长期流动在外因年老无法生存而回原籍,由于户口是属于另一地区的城镇居民,要求享受“五保户”待遇被村委会拒绝而与镇政府对抗,后被镇敬老院收留后就立即成为了宣传政府的使者,等等。这样一些边缘化且不稼不穡的人,能否真正代表农民?记者W先生发现,他们要么向农民集资维生,要么要挟当地政府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自从今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就发现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再也没有任何市场。^⑫

自身立场的不同便是导致所述农民评价完全相反的原因之一。在实地研究中笔者时常碰到对于一个人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某人是“出风头、显摆,制造矛盾和不和谐”,甚至认为是“假公济私,扛群众的旗号,做他自己的私事”;但也有人认为这事必须有人出头来办,他是为民办事。这就牵涉到判断的立场与视角。研究对象的评价依据研究对象自身的自述还是不同主体的他述,这是一

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至少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与视角的影响。

2. 调查地与调查对象的因素

调查地涉及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习俗等因素,但容易忽视的是所谓的“守门员”的影响。陈向明论述了质的研究中进入现场中的确定和接触“守门员”对研究的质量影响。“守门员”由于自己的特殊位置,通常对研究有一定的顾虑。^③比如在某些学校里,校长可能认为自己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保护者,担心研究会搅乱学校的正常教学,占据教师太多的时间,影响学生的注意力。但是有时候,也许这位校长是一个办事严谨的人,希望对自己学校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如果研究者不事先获得他的同意,他可能感到十分恼怒,并采取行动阻挠研究的进行。另外,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对自己学校的形象十分在意。^④他们不愿意过多地暴露学校工作中不好的一面,更不希望研究者把自己的学校报道得一无是处。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很可能想方设法阻止研究者了解学校的阴暗面,或者试图对研究者的行为进行控制或“指导”。

通常,“守门员”和当地的被研究者们都对研究者抱有一定的期待。他们认为研究者是某领域里的“专家”,应该有能力对他们目前的工作进行指导。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能被当作一个权威,不得不做一些他也许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比如为学校的改革出谋划策。但是,如果研究者因此而变成了“行动者”,他的身份就会与研究者的应该着意表现出来的“学习者”形象不吻合。^⑤另外,作为一名外来的“闯入者”,研究者的存在也可能使“守门员”感到焦虑不安。他们不知道研究者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甚至可能认为研究者在对自己的工作评头论足。因此,他们可能有意制造一些障碍,不让研究者看到调研地形象不好的一面。唐昊等在湖南衡阳县调查农民抗争时就曾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与阻碍^⑥。

关于调查对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调查对象提供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实地研究的资料的真实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一个事件,由于立场不同,各方的描述和评价有时会完全不同。有句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即屁股所在的位置,决定着脑袋里的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一个人的利益立场影响着其一言一行。个人的立场会决定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评判标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辩护。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调研对象的利益立场。

笔者在一个实地研究中联系上访村民,介绍完自己后,对方会表现出非常高兴的神情,希望事情能得以解决。在他们心里是多么渴望立刀断案的人物出现,于是笔者在联系访谈时一般都会受到这样的质问:“你先说说你问这事能起个什么作用?”“你能帮我把这事向上面反映吗?”“能解决这事吗?”在各种媒体上呈现出来的记者的能力与权力以及曝光而致的事情火速解决被受访者转移到笔者身上。他们对笔者调研的支持一部分原因正是源出对笔者的过高期望。调研中,有些村民以为笔者是上级政府部门派下来的,更多的是以为笔者是记者,对笔者寄予厚望,用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讲述着不公平。而对于这样的调研对象,我们在给予同情时一定要提醒自己在获取资料时抱着中立的情感。

3. 调查内容的因素

不同的调查内容,与调研对象利益牵涉度不同,在同样的情形下所获得的资料可能是不一样的。在高度敏感的问题调查中,能否给被访者提供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让其既能够愿意接受调查又能够作真实的回答,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抽样调查中,经常会遇到个人私事的访谈,由于涉及到调研对象的隐私问题,有时很难直接得到调研对象的配合,因此造成了调查的困难、调查结果的不准确。调查者会采取许多措施来应对,比如进行投射性测验或改进工具,使用电脑来进行问答。潘绥铭等针对“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使用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⑦而对于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考虑。

对于实地研究,由于要用资料的深入性来代替问卷调查的普遍性,实地研究要求长时间地与研究对象接触,匿名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实地研究中,总会涉及到调查对象的个人性问题。这样,考察内容的不同,对于获取的资料也有类似影响。调查内容与调查对象的关涉度影响到调查对象参与的积极性。处于调查内容中心与边缘的不同对象其态度与热情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当外来人与当地人一起分析后者的生存状态时,前者面临着很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果让当地人在发展项目中介入较多,他们会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抱有过多的热情和期待。虽然从原则上讲,这对开展项目十分有利,但是如果捐助机构所承诺的资助无法兑现,导致行动计划无法实施,当地人的积极性将会

受到极大的打击。此外,当外来“专家”协助当地人制定发展计划时,后者可能期待着前者会一直为他们提供技术援助。而如果前者在收集了自己需要的资料后便一去不复返,那么后者会对他们感到非常失望,进而对这种合作的方式也感到失望。有时候,调研对象在得知一个外面的知识分子下来了,于是会热情积极地跑到你在实地的住处,希望向你陈述其带着一定目的的事情。而一旦得知你的调研目的与其目的不一致时,或者调研内容与其反映的事情相关,而你表示无力直接作用于事件时,他们会很失落,并且消极应付调研。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反映问题时,问题相关往往都带着一定的夸大或者强调的倾向。这一点需要我们调研者在呈现结果时予以重视。

三、实地研究资料判别的方法讨论

对于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研究者至少需要从方法意识到实施调研、资料收集,再到资料分析与呈现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在方法意识上,研究者应对影响资料可靠性的因素有清醒认识

保持调研中的反思性是必须具有的一种态度。问卷调查中一个个较简单的问题及选项使被访问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匿名身份,研究者对于可能影响问卷的回答的因素作了充分的估计。那么,笔者认为,面对涉入“事件”当中的调研对象提供的信息,实地研究者对资料的判别应特别关注实践中可能影响到资料可靠性的因素。实地研究者不仅要要是法官,而且还要是内部人。我们知道,法官其辨别力是强,但有些内幕法官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而内部人却可以“关起门来”分享此等秘密。因此,研究者既要做台前的法官,也要做幕后的“自己人”,必须要具有清醒的判断力,否则就可能被蒙骗或误导,调研对象以一种标准的、意识形态的或“舆论一致”的、自我立场合法化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

保持反思性的关键是需要从权力关系与利益立场来考虑。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惩罚与监禁》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产生的激烈的、后现代命题——简而言之——知识是权力的产物。苏力曾经从权力的关系角度对法律社会学调查进行了探讨^②。结合笔者实地研究的实践,笔者认为除了将权力关系迁移进来考察外,利益立场也是资料判别的一个很好视角。

实地研究收集的资料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利

益嵌入性。研究者往往带着一定的利益立场,而研究对象更是有着利益立场。而实地研究的研究对象的抽样一般是采取目的性抽样,又称“理论型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即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地点和事件。而抽取的人、地点与事件对于实地研究来说,都是嵌入利益的。因此,对于实地研究的资料判别需要考虑到利益立场问题。

(二)在实施调研的过程中,调研者应注意观众效应

实地调研者,作为一个外来者,对于调研对象及调研事件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于是有了调研中的道德问题。但是实地调研者对于调研对象本身有着一种潜在的观众效应,这一点往往为调研者所忽视。调研者的入场就如观众进场一样会给人一种社会刺激的效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观众在场时往往会唤起有关别人正在进行评价的想法,这可能是较为重要的动机。关心来自他人的评价,往往会唤起个人的内驱力,也就是使行为个体产生了趋向达到目的的驱力,从而起到了促进行为的“观众效应”。实地调研者进入实地过问有关事件,是对调研对象很大的心理支持,有时甚至会激发他们的行为。同时,普通民众有着扩大夸张的诉苦心理——应星认为这是我国大众诉苦文化的扩散——特别是他们自认为笔者是上面派下来的或者是记者的时候,将问题严重化的倾向更有可能。所以对于调研者来说,应该对此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因此调研中要善于去伪求真。

(三)在资料收集上,调研者应多方求证资料

由于不同调研对象的不同利益立场及实地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权力关系,要提高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就应该全面加强研究资料的横向和纵向的印证,通过多重情境确认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在不同利益立场的信息提供者之间更接近真实。调研资料的真实性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者的主观世界是否与客观世界相吻合的问题。一些研究者不是寻根究底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而是听了风便是雨,草率成稿;不是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做研究”,而是听汇报、打电话采访,甚至打着调研的幌子杜撰情节。“入深水者得大鱼”,“脚底板下出文章”。深入调研、多方求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是资料可靠性的一种保证。那些能够“沉下去”的调研者才能理直气壮。在一个征地事件中,笔者曾为了核实某村民递交到信访办的关于强行征地的报告,分别通过

镇干部、村干部、征地单位以及村民本人,最终才核实了报告中哪些情节是符合事实的,哪些是被夸大的情节和被隐瞒的情节,才弄明白一些情节被夸张和隐瞒的原因。

(四)在资料分析与呈现上应规范化

资料收集了以后需要进行分析。正式开始分析之前,要认真阅读原始资料,经过“投降”和“怀疑”两个过程以保证自己熟悉资料的全部内容。在阅读资料时,需要采取一种“投降”的态度,即放弃自己原有的“预设”和“偏见”,尽量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资料所浮现的意义中,并反思自己的即兴反应,同时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审视所收集的资料。

有人通过对我国调查研究论文的综述分析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的结果呈现中对方法的介绍。对方法的介绍是科学研究论文的必备条件,是其结论成立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同时也可以使读者和同行切实地了解作者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普遍性和适用性。^⑨笔者认为,对资料的收集及判别同样有如此意义。在资料的呈现中,若不能判别,那么就应该标明陈述者,由读者去理解,而不应该以作者的语言来转述,应在介绍陈述者的利益立场的基础上采用引述的形式来呈现研究资料。

规范的且符合本土现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目标,是要为创造出接近客观现实的知识提供可靠的保障。而作为研究成果的论文则是这种努力的直接反映。要强调经验研究论文发表的规范性要求,这是目前较为薄弱且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方面。^⑩笔者认为,实地研究的论文也应有专门资料判别介绍。

注释

①⑤⑫⑬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②由于实地研究、定性研究、质的研究与田野工作(调查)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因行文的方便而使用了不同的称谓。

③⑦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第260-261页。

④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⑥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⑦⑧风笑天、田凯:《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⑨李春青:《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评价标准与方法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⑩文军:《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

⑪P. Baert. 1998,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31.

⑬风笑天:《社会学者的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⑮我们可以在方舟子负责的新语丝网站上找到不少实例。就社会学一级学科范围来说,也有不少实例。

⑯秦裕、韩震:《方法就是事物本身》,《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⑰R. A. Barrett & Benabarre. 1974, *The Modernization of a Spanish Vill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⑱⑲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研究者如何进入研究现场》,《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

⑳㉑苏力:《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一个社会学调查过程的反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㉒详见陈文胜:《中国三农学界的五种倾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1期。

㉓W记者的见闻被引用后引起了到衡阳县调查过的署名为陈愚的反应,他们在实地调查中同样听到当地乡镇干部这样评价维权农民的,并且批评了W记者仅仅就是据乡镇干部说什么就写下了什么。陈愚自称是南风窗2003年十月下半月《农村的危机与希望——衡阳调查日记》一文的作者。参见陈愚:《评严晋〈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http://cohumn.bokee.com/93877.html, 2005年10月9日。

㉔Martyn Hammersley & Paul Atkinson.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p. 65.

㉕E. Smigel. 1958, Interviewing a Legal Elite: The Wall Street Lawy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4.

㉖唐昊、陈璧生:《农村的危机与希望——衡阳调查日记》,《南风窗》2003年(10B)。

㉗王爱丽:《一项关于社会敏感问题调查的成功例证——“电脑问卷调查法”在“中国人的性生活”调查中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2年Sexuality研讨会论文。

㉘风笑天:《结果呈现与方法运用》,《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㉙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所面临的任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张静